# 印歐語與漢語歷時類型概論*

張志毅

## 1 從類型學談起

1.1 本文的論題，是屬於歷時類型學（typology）範疇的。19世紀初葉，從類型學產生時開始，洪葆德（K. W. von. Humboldt 1767－1835）、施萊哈爾（A. Schleicher 1821－1868），直到馬爾（H.J. Mapp 1864－1934），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印歐語和漢語作過比較。結論是：漢語是孤立語，是“最不完備的”“原始的”語言，而印歐語則是“最完備的”“發達的”語言。二者分別處於語言發展的初級和高級階段上。到本世紀七十年代，安蒂拉（R. Anttila）還堅持這種觀點。

1.2 19世紀末葉，類型學進一步發展，上述的結論被當作無法證明的假說而被拋棄了。葉斯柏森（J. O. H. Jesperesen 1860－1943）、高本漢（Bernhard · Karlgren 1889－1978）等人認爲，漢語同英語一樣，是“進步的”“高等進化的”語言。但是，他們沒有令人信服地說明漢語和英語到底有哪些共同的地方。

1.3 現代類型學，不主張從進化論的角度評價各種語言的優劣，而主張繼承並綜合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某些成果，揭示各種類型語言的特點、變化的類型以及內在聯系的普遍的發展規律。並且强調把從前的形態類型研究擴展到語音類型、語法類型、詞彙類型研究方面。因而本文將從語音、語法、詞彙幾個方面的一些發展趨勢，比較印歐語和漢語的共同的及相關的地方，僅把印歐語和漢語的歷時類型作一簡要概述。希望借以補充類型學的空白，並改變對印歐語和漢語的某些陳舊的看法。

## 2 語音歷時類型

2.1 近一個世紀，許多國家的語言學家的研究結果表明，印歐語的語音發展，就幾個方面說，出現了簡化的趨勢。漢語也有同樣的趨勢。不過，因爲語言類型的差異，簡化趨勢的具體內容不完全相同。

---

* 審閱過本文的有如下諸位先生：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易嘉樂（Sφren · Egerod），奧斯陸大學博士何莫邪（Christoph · Harbsmeier），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伍鐵平，北京大學石安石，吉林大學許紹早、張彥昌、孫延璋，東北師範大學宋振華，山東大學薛德泰，北京師範大學尹黎云。教正多處，不勝感謝。

2.2 印歐語語音的簡化，我們可以從輔音叢（consonant）① 簡化和元音簡化上考察。

處於詞首的，特別是處於詞尾的輔音叢，簡化的趨勢是很明顯的。古英語詞首的〔hr〕〔hl〕〔hn〕〔kn〕〔gn〕〔wr〕，到現在都丟掉了第一個輔音。其中在中世紀晚期丟掉了〔h〕，如hring＞ring。在現代早期丟掉了〔k〕〔g〕〔w〕，如gnagan ＞gnaw〔nɔ:〕。詞尾的〔－ng〕〔－mb〕都丟掉了後一個輔音。long今讀〔lɔŋ〕，climb今讀〔klaim〕。

處於詞中間的輔音也時常簡化。如古俄語的-ГН-，-БН-，到現在時常丟掉第一個輔音。例如 ѦВИГНУТИ＞ ѦВИНУТЬ。

當然，印歐語至今還有一些輔音叢。而漢語則早已完成了輔音叢的全部簡化過程。多數學者認爲，上古漢語存在過輔音叢。其內證是：漢字的諧聲字、異讀、異文、讀若等都有很多遺蹟，古代口語詞、方言詞、譯音詞也有許多遺蹟。其外證是：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都有輔音叢。古代的輔音叢有的單化了，有的整個失落了，於是就表現爲現代漢語沒有輔音叢的現代面貌。

印歐語還有過元音簡化的趨勢。博杜恩·德·庫爾特內（И. А. Бодуэн ѧ e kypTeHэ）經研究確定，幾乎所有的斯拉夫語語音系統最重要的發展趨勢之一，就是它們的元音系統在最近一千年的期間內都在簡化。② 在8世紀以前，在共同斯拉夫語中，有* en、* on，但在開音節規律起作用後，到古斯拉夫語時期，分別變爲兩個鼻元音 $\overset{e}{s}$（Ѧ）、$\overset{o}{s}$（Ѫ），再往後發展分別變成 Ꙗ（'a）、Ꙋ，鼻元音終於消失了。12世紀以前，在古俄語中，有兩個由ъ、ь表示的弱元音，發音很像短促的o或e，到現代已經消失了。處於詞尾的元音更容易弱化以至消失。俄語在11－13世紀，詞尾ТИ不帶重音時И便弱化，最後消失，詞尾變成Ть；現代俄語詞尾ТИ是舊形式的殘留，殘留的條件是ТИ讀重音。此外還發生過非重讀元音對立消失的現象。如非重讀元音о、а在18世紀中葉還是對立的，到19世紀中葉對立消失了。非重讀元音И、е在本世紀30年代還是對立的，到50－70年代，在一般口語裏，完全消失了。④ 在法語從拉丁語脫胎、演變過程中，元音也發生過一些較大的消減。

印歐一些語言，有過複合元音向單元音轉化的趨勢。從共同斯拉夫語向各斯拉夫語發展過程中，在輔音之前或詞尾的複合元音轉化爲單元音，以И結尾的一些複合元音轉化爲單元音，複合元音〔oi〕轉化爲單元音。18世紀中葉俄語還有元音ѣ，發作二合元音或准二合元音$\overset{\frown}{\text{И}}$э，到19世紀中葉，ѣ 併於元音э中。12－16世紀，法語的複合元音也有轉化爲單元音的，如tout念成〔tu〕，fait念成〔fɛ〕。這種趨勢，在現代英語中仍然存在着。如〔ei〕＞〔e〕或〔ɛ〕，〔eiə〕＞〔e:ə〕，〔aiə〕＞〔a:ə〕＞〔a〕，〔əuə〕〕＞〔ə:〕等等。

現代漢語，雖然比印歐語富於複合元音，但是在漢語發展中，複合元音單元音化的趨勢也存在過。7－12世紀，在漢語的韻母中，大約有40左右個複合元音，4個單元音，到現代只有13個複合元音，而單元音卻增加到10個。這說明，有許多複合元音在一

定條件下轉化爲單元音。在這類變化中，大多數低元音轉化爲高元音，這就是“元音高化”的規律。

2.3 關於漢語的語音簡化，我們還可以從音節中的聲母、韻母以及音節的數目來考察。

首先看聲母的簡化。7－12世紀，漢語大約有36或37個聲母。到14世紀，北方話只有24個聲母了。到現代，普通話只剩下21個聲母了，而且還有很多字變成了零聲母。而一部分帶〔ɣ－〕〔ŋ－〕〔m－〕〔ɳᵊ－〕等聲母的字，早在中古至近古時期就變成了零聲母。如“雨、雲”（ɣ－），“牙、月”（ŋ－），“霧、聞”（m－），“日、兒”（ɳᵊ－）等。這類現象，也就是音節開頭輔音失落現象。在聲母簡化中，比較主要的變化是，〔b〕〔g〕〔d〕〔dʑ〕〔dʒ〕〔v〕〔dʒ〕〔z〕〔ʑ〕〔ɣ〕等濁輔音變爲相應的清輔音。這就是“濁音清化”的規律。這個規律，在漢藏語系的許多語言中形成明顯的趨勢。而在俄語的語流音變中則僅僅出現一點苗頭。如詞尾的ж、з、ъ時常變成ш、С、Т。這可能導致語言的歷時音變。

其次，看韻母的簡化。7－12世紀，漢語有325個韻母（如不算聲調，有150多個）。到13－14世紀減少到200個左右，到現代只剩下140多個（如不算聲調，只有39個）。韻母雖然也有分化，但是合併是主流。對這個趨勢，可以從韻的合併和韻尾的合併兩方面來說明。

7世紀前後，反切中保留了明顯的合併韻的遺蹟。當時的韻書雖然分爲206韻，但是在反切中常混用。據統計，當時有關仙韻〔* iɛn〕和元韻〔* an〕的137個反切中，已經有23.7%的反切把兩個韻混用了。

13世紀以前，韻尾共有三種：一是元音收尾的開音節，二是〔－m〕〔－n〕〔－ŋ〕鼻輔音收尾的閉音節，三是〔－p〕〔－t〕〔－k〕口輔音收尾的閉音節。最晚到16世紀，〔－m〕尾消失了，併入〔－n〕尾中。最晚到14世紀，〔－p〕〔－t〕〔－k〕消失了，變成了開音節。

有人推測，在上古漢語的早期，還有以〔s〕這個口輔音收尾的閉音節。大約在上古漢語的早期和中期之交，〔－s〕尾消失了，帶〔－s〕的字變成了去聲。而〔－s〕尾在現代藏語裏還保留着，其功用之一是把動詞變成名詞，如〔'ɡ raŋ〕（數，動詞）＞〔graŋs〕（數，名詞）。這恰好相當於漢語的去聲功能之一。⑤

最後，看音節數目的減少。據統計《切韻》有3600左右個音節，《廣韻》有3877個音節（這兩部韻書雖然不能代表一時一地的語音，但大體上反映了中古漢語的語音概貌）。到現代，只有1332個音節。⑥

這樣一來，是否就像法國的葛蘭言（M. Granet）所說的：“無論如何，在中國歷史上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口語，似乎已是一種語音上非常貧乏的語言。”⑦如果所謂“語音貧乏”是指音節數目，那就不對了。古代漢語的音節數目，跟現代英語是相仿的，現代英語也只不過有幾千個音節。現代漢語的音節數目雖然比古代減少了許多，但是仍然比只有112個音節的日語音節數多得多。問題在於，語音貧乏與否，不能看音節的數目，

得看音節和音節排列（permutation）成詞的情況。近代和現代漢語，比古代漢語常採用兩個音節排列成詞的方式來補償語音的簡化。我們不妨用數學排列公式來計算一下從1332個音節中每次取兩個音節的排列結果：

$$A_m^n = m(m-1)(m-2)\cdots\cdots(m-n+1)$$

$$A_{1332}^{2} = 1332(1332-1)$$

$$A_{1332}^{2} = 1772892$$

這就是說，可以排列成 170 多萬個不同的兩個音節組織形式。當然這只是理論數字，其中雖然已經包括了音節不同次序這一因素（ab 一組，ba 又一組），但是還沒有包括重疊、輕聲、兒化等因素。因此實際數字，可能增加一些；受另一些因素制約，也可能減少一些，但不會離這個數字太遠。這個數字用來傳達再繁多的語言信息都足夠了。可見，漢語語音的簡化並不是貧化；它用較經濟的語音個體（音位），通過能產的組織形式，使漢語語音的整體豐富了，更富於表現力了。

## 3 語法歷時類型

### 3.1 內部屈折變化的消減

先看看印歐語的內部屈折變化情況。

在所有的印歐語裏，都有元音屈折現象。以德語的bruch（折斷）爲例：

| 元音屈折 | 意義 |
|---|---|
| bruch | 折斷，挫傷，骨折 |
| gebrochen | 被折 |
| brach | 折斷了 |
| bräche | 如已折斷（虛擬式，過去時） |
| brechen | 折斷（不定式） |
| briche | 折斷!（命令式） |
| brüchig | 易折斷的 |
| ab-bröckeln | 打斷，弄斷 |

在這個詞根裏，標準德語用了它的全部單元音表示八種屈折，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系列。

這種複雜的元音屈折，在現代印歐語裏已經不多見了。古代英語的元音屈折曾經是名詞複數的重要表達手段之一。如boc＞bec（許多書）。現代英語的名詞複數，除了沿用古代的少數內部屈折形式以外，一般都採取外部屈折，即詞尾附加形式（現代加－s或－es，而古代是加－as或a）。如book＞books（許多書）。內部屈折對構成過去式、

過去分詞來說，在古英語中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到現代英語中則成爲補充手段。如sing＞sang＞sung已被列入動詞的不規則變化。

內部屈折，在俄語裏也逐漸受到限制。現在構詞法上已很少用內部屈折，如「оπ（赤裸裸的，短尾形容詞）＞「опb（赤貧者，名詞）。在構形上，內部屈折只限於構成某些動詞不同的體，如Ha 3 bI BāTb（稱呼，未完成體）＞Ha 3 BaTb（完成體）。像俄語這樣較典型的屈折語，只剩下外部屈折保持着相當高的能產能力。

再看漢語的內部屈折情況。

上古漢語也有元音屈折現象。如〔*hiuəi〕（動詞，圍）：〔*hiuei〕（名詞，帷，即圍布）。〔*hoang〕（形容詞，橫的）：〔*heang〕（名詞，衡，即秤桿，秤）。〔*piuən〕（動詞，分）：〔*puən〕（名詞，半）。⑧ 與這種現象相同的珍貴資料，至今還保留在陝西商縣方言中。⑨ 請看下表:

| 動詞 | 噴 | 淋 | 病 | 動 | 取 |
|---|---|---|---|---|---|
| 普通體 | p'ɛ̃ | liɛ̃ | pi | tuə̃γ̃ | t'y |
| 完成體 | p'ɑ̃ | liɑ̃ | piaγ̃ | tuaγ̃ | t'yɛ |
| 用例： | 噴漆啦 | 淋雨啦 | 病啦 | 動工啦 | 取錢啦 |

上古漢語的輔音屈折用得更多些。如〔*djiat〕（不及物動詞，折）：〔*tjiat〕（及物動詞，折，弄斷）。〔*kyan〕（主動詞，見）：〔*hyan〕（被動詞，被看見）。〔*keôk〕（動詞，教）：〔*heôk〕（名詞，校）。到隋朝，顏之推已經自覺地把這類現象記錄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軍自敗曰敗”讀濁聲母，“打破人軍曰敗”讀清聲母。至今在普通話中，還有這類現象的許多遺蹟。如說quān（圈）是圓或圍，如用於牲畜則說juān或juàn。

元音和輔音屈折，是印歐語裏常見的。印歐語裏不常見的是聲調屈折。用聲調區別詞義和詞性，一直是古代漢語的能產手段之一。如上古漢語的〔*sjian³〕（名詞，扇）：〔*sjian¹〕（動詞，搧）。〔*dzuai²〕（動詞，坐）：〔*dzuai³〕（名詞，座）。〔*diuan¹〕（動詞，傳）：〔*diuan³〕（名詞，傳）。東漢鄭玄在《三禮》注中，高誘在《淮南》《呂覽》注中，已經明確記載了這類材料。漢末劉熙《釋名》大量用了四聲別義。唐初陸德明對四聲別義多有辨析。到宋元時，賈昌朝、劉鑑辨析得更加詳細。如說“毀”讀上聲指“壞他”，讀去聲指“自壞”。“共”讀平聲指“上賦下”，讀去聲指“下奉上”。“雨”讀上聲是名詞，讀去聲是動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去聲能區別內向動詞和外向動詞，如買/賣〔*me〕，受/授〔*zjiu〕，“賣”“授”都是外向動詞，讀去聲。⑩ 今天陝西商縣方言口語中還保留着這類語法性音變的遺蹟。如用聲調（兼延長元音）表示動詞（多是單音的）的完成體：“雲把太陽遮半子（半邊兒）”的“遮”，普通體是21調，完成體是3231調。這個方言還用聲調區別人稱代詞的單數和複

數，如〔ŋɣ〕〔ɳi〕〔t'a〕說成53調是“我”“你”“他”，說成21調是“我們”“你們”“他們”。這大約透露了西周鎬京西南方言特徵的一點消息。

總之，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漢語的內部屈折既用於構詞，也用於構形。上古漢語還沒有發現外部屈折的遺蹟。有些詞雖然是收尾音發生變化，但是仍然屬於詞根之內的變化，即仍屬於內部屈折。如〔*piuə〕（不，通用）：〔*piuət〕（弗，用於特定場合）。

古代漢語存在屈折變化，還可以拿漢語的親屬語言現代藏語、彝語、羌語等保留的屈折變化作爲旁證。限於篇幅，這裏從略。

從前，外國語言學家，除少數以外，多數認爲漢語是沒有屈折變化的語言，並因此說漢語是落後的語言。這種錯誤論調，是受了19世紀初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家施萊哈爾（A · Schleicher）的影響。顯然，他們沒有發現古代漢語的元音屈折、輔音屈折，無視聲調屈折，更沒有注意到現代漢語的“兒化”屈折及少量的重音屈折現象。因而他們也不可能看到，漢語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屈折現象簡化了。就這個歷史趨勢說，印歐語正朝着漢語的方向走來。如果迄今爲止，他們還認爲屈折語優於其他語言，那麼他們顯然是持有囿於自我中心說的偏見。如果擯棄這種偏見，他們就該正視一個基本事實：屈折現象正在簡化。

3.2 格形態逐漸消失

格（case），作爲語法範疇，如果從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算起，人們對它的研究已經有2100多年的歷史了。漫長的研究史，越來越清楚地證明，幾乎所有的語言都沒有保持格的古老面貌。

古印歐語名詞有 8 個格，到古典拉丁語剩 6 個格（包括 5 種變格類型），到 7 世紀民間拉丁語只剩下 2 個格（包括 3 種變格類型）。到13世紀末葉以後，由民間拉丁語發展而成的各羅曼語的名詞變格一般都消失了，像現代法語那樣。

雖然斯拉夫語族的現代各語言較多地保存了原始印歐語的格形態，但是也不斷地改變着自己的面貌。這只要觀察一下俄語的歷史便一目了然了。古俄語名詞有 5 種變格類型，每種變格類型都分單數、複數、雙數。而雙數有 3 個格。單數、複數各有 7 個格，比現在多一個呼格（vocative），這個格用於呼語，而現代俄語則取消了這個格，使併入第 1 格。這種簡化，從11世紀便開始了，到現在不僅只剩下 3 種變格類型，而且每種變格類型只分單數、複數，取消了雙數，而單複數中又都只剩下 6 個格，而 6 個格的變化又越來越趨向於統一、簡化。如陽性名詞第 2 格，在19世紀時，如果表示數量或否定，以用-y 爲規範；其他場合用-a（-я），而在當代俄語中趨向於都用-a（-я）。哥拉烏吉那（Л. Граудина）統計過1018個用例，其中用-y的有256個，用-a的有762個，比例爲 1 ： 3。-y形式已經退居到指小、表愛以及固定詞組等狹小的世襲領地。陽姓名詞第 5 格詞尾，不久前有-ой(-ей)和-ою（-ею）兩種形式，現在趨於使用-ой（-ей）這一種，逐漸淘汰-ою（-ею）。俄羅斯的權威語法學家波鐵布尼亞（A. A. Потебня）早就指出，表示行爲方法的第 5 格有脫離變格體系，變成獨立副詞的趨向。如авась

（預支）的第5格變爲aBaHCOM（提前）。⑪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BO，-HO，-ОЄ結尾的地理名詞，從40年代初開始，特別是60年代以後，趨向於不變格。其他名詞也有不變格的趨勢。⑫ 至於不變格的形容詞（即分析型形容詞），近20多年來也逐漸多起來，如ЭлekTPNK（藍色的），ХИНЯ И（印地語的）。

古日耳曼語從古印歐語簡化爲4個格。現代德語雖然仍有4個格，但是局勢並不穩定。第2格（即“純格”，der reine kasus）正在退化。雷尼斯（L·Reiners）曾呼籲“挽救第2格”，但是在大勢所趨的形勢下，他也消聲匿蹟了。第3格也在衰退，名詞第3格所加的-e也在消失中，只有在需要照顧到音節節奏時還保留着。同第2、3格退化相伴隨的現象是，使支配第2、3格的動詞“介詞化”，這種用法已經被認爲是追求表達清楚的趨勢。

英語在中世紀以前，也有主格、賓格、所屬格、間接賓格等4個格。形容詞和某些代詞還有造格(instrumental)的遺蹟。到現代英語，形容詞已經失去了格的變化，而名詞習慣上說它有主格、賓格、所屬格這3個格，實際上主格和賓格已經失去了形態區別。所屬格的形態，也只限於有生命名詞以及某些時空名詞、團體報刊名詞。因此，嚴格地說，只有一部分名詞還保留着所屬格的形態。而許多語言的事實證明，代詞是格在趨向消失演變中佔據的最後一個堡壘。不管這個堡壘多麼頑固，它也是逐漸在縮小。當代英語在疑問句或賓語從句中，who可以取代whom，在某些句子中I也可以取代me。埃萬斯（Bergen·Evans）說得對：“當代詞出現在問句之首的時候，講自然、流利、文學性英語的人總是用代詞的主格，不管它在語法上是什麼格。”⑬

順便來考察一下漢語的格形態。如果我們把視野一直擴展到上古漢語的中期，特別是早期（公元前13—7世紀），那麼便會發現，代詞這個最後堡壘，仍然固守着格形態。如“余”（予）〔*jia〕，在《詩經》《書經》和宗周銘文裏，多用於主格，少用於賓格，更少用於所有格，而在甲骨卜辭裏只用於主格。“朕”〔*diəng〕，在《書經》裏多用於所有格，少用於主格，更少用於賓格；在《詩經》裏根本不用於賓格，在甲骨卜辭、宗周銘文裏不僅不用於賓格，也不用於主格，只用於所有格。“乃”〔*nə〕，在《書經》裏絕大多數用於所有格，很少用於主格，不用於賓格；而在宗周銘文和甲骨卜辭裏只用於所有格。“女”（汝）〔*njia〕在《書經》《詩經》和宗周銘文裏多用於主格和賓格，很少用於所有格，而在甲骨卜辭裏則多用於賓格，也很少用於所有格。

根據格逐漸簡化這一普遍規律，從上古漢語代詞格形態的遺蹟往前推測，遠古漢語（即史前時期漢語）比上古漢語肯定有過較多的格形態。這個推斷，完全符合梅耶（A. Meillet）的傑出命題：“形態是古代殘蹟的領域。”⑭

形態單位，並不像某些語言學家所說的那麼重要。事實上，形態單位的意義，大多是詞彙或句法單位意義的重複。如俄語的與格（dative）、在格（locative）、工具格（instrumental）都重複着某些前置詞的意義。主格和賓格在一定的詞序中重複着主語和賓語的意義。因此，格形態單位並不是語言中不可缺少的。印歐語和漢語一樣，發展的趨勢是，形態越簡單越好，詞形越不變越好，最終達到觀念和詞之間的簡單直接對

應，甚至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也由相應的詞來表達。這就牽涉到由綜合結構向分析結構發展的問題。

3.3 向分析結構發展的趨勢

印歐語，近幾個世紀，幾乎都出現了由綜合結構向分析結構發展的趨勢，只不過是發展的速度不盡相同。俄語稍慢，德語和希臘語稍快，法語、特別是英語、保加利亞語最快。

打開現代世界上的語言廚窗，便會看到某些語言還保持着極古老的形態。如巴斯克語（Basque）竟然用一個動詞的 150 個不同的形式來表示英語的 have has，had三個形式的內容。立陶宛語（Lithuanian）的農民口語中不僅有兩個原始性的聲調，而且有花樣繁多的詞形變化。這樣的語言，比構擬出來的公元前 500 —1000年的日耳曼語的祖語還古老，而跟梵語一樣，接近綜合結構的印歐語原型。相比之下，盡管俄語蹣跚地向分析結構走來，但是畢竟也走過了相當的里程。

俄語的文獻有 900 年的歷史。這段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表明，俄語取消了某些綜合結構，採用了具有同樣功能的一些分析結構。如前所述，它的多種名詞變格系統簡化了，與之相應的是前置詞的數量增加了，運用的範圍擴大了。從前只用格形態表達的，現在常用分析結構來表達，如 аилучшиий>самыйлучший（最好的），這就是由綜合結構向分析結構過渡的形式。⑮ 又如雙數詞尾消失了，代之以оба、два等數詞加上名詞複數形式。古俄語說очи（雙眼）、домы（兩座房子），現代俄語說обаглаза（очи）（兩隻眼睛），два дома（兩座房子）。從11世紀開始發現雙數和複數相混，到13世紀雙數基本消失，現代只是在某些詞的詞尾（дома）還殘留著雙數的遺蹟。此外，俄語時制形態體系早已開始並正在瓦解。如某些以-нуть結尾的動詞，趨向於去掉-нул這樣過去時形式，這種用法比保留-нул肯定有前途。還有一部分時態用動詞組合結構來表達。比上述這些更具有典型意義的分析結構是多項第 1 格定語。它從19世紀末開始用來表示棋局和空間關係，如гарри бундаров-смирницкий（布達哥夫對斯米爾尼茨基一盤棋），участок афины-гарижи（雅典至巴黎區間）。到20世紀60年代，它擴展到表示競賽、對應關係等。

拉丁語、日耳曼語在中世紀早期就出現了用動詞組合結構（如英語 have be，或become加過去分詞）來表示完成和被動形態的意義。英語還可以用前置詞 of 的組合結構表示古代屬格的意義。甚至英語代詞所有格形態也可以讓位給分析結構。如 its（它的）也可以說成 of it。德語動詞第 2 格賓語，逐漸被介詞賓語所代替，幾百年來的這種趨勢已經被當代德語語法學家所公認。

拉丁語、日耳曼語向分析結構轉化過程中，它們的許多形態在逐漸減弱、消失。如在共同羅馬語時代以前，虛擬式（subjunctive mood）是拉丁語動詞的主要形式，並且支配着整個拉丁語的造句法。在共同羅馬語時代以後，虛擬式的作用不斷受到限制，特別是在現代法語口語裏它們的用途逐漸縮小。雖然在英語裏的虛擬式還有較大的市場，但是削減的趨勢也是較明顯的。好多虛擬式已經用條件句表示了。又如英語的後置定語

常前置，功能詞逐漸省略，形容詞的比較級和最高級逐漸用more、most 代替-er。-est（當然在某些句子裏用-er，-est似乎更有力）。這正如巴波（Charles · Barber）所說的：“有一種明顯的、廣泛的趨勢：英語已經越來越少地依賴詞尾體系，而越來越多地依靠詞序和功能詞（如前置詞、助動詞）。”⑯

這個趨勢，正是漢語所顯示出的狀況。漢語從有文字記載以來，3千多年一直依靠詞序和功能詞。這是中外學者人人皆知的事實。這個事實，正是經過幾千年、幾萬年甚至數十萬年發展演變的結果。既然印歐語也是朝着這個方向走來，那麼對漢語的現狀也就無可非議了。

## 4 詞彙歷時類型

4.1 詞彙日益豐富，這是各種語言共有的趨勢，也是衆所周知的常識。這裏要比較的是另一些趨勢：詞的語音形勢縮短與伸長的趨勢，詞彙的抽象化和具體化的趨勢，詞的有理據性和無理據性的趨勢。

4.2 詞的語音形式縮短與伸長的趨勢

有史的最古的印歐語的詞根（注意：不是“詞”）都只含一個音節，⑰ 而史前印歐語的詞根則有過多音節佔優勢的階段，如*deiwo-s（神）＞古拉丁語deivos＞divus＞dius。由於元音的弱化以至減損，或由於詞尾脫落，使原來詞根的後面部分變成了詞尾。

經過歷史演變，印歐語的許多語言的詞形（或實際語音形式）都縮短了。索緒爾（F. D. Saussure）早已發現，德語詞根（注意：不是“詞”）差不多都是單音節的，面貌相當整齊。如果不算用複合法造出的長詞，那麼正像門哲萊斯（P. Menzerath）所說的，德語詞（注意：是“詞”）主要是八個或九個音素組成的雙音節詞。而英語呢，布龍菲爾德（Leonard · Bloomfeld）說，從共同的母語出發，我們發現現代英語詞形大大地縮短了。縮短到什麼程度呢？考痕（Marcel · Cohen）的回答是，英語中的日耳曼詞幾乎都變成了雙音節或單音節的短詞了，常用詞大量地變成了單音節。烏爾曼（S. Ullmann）的回答是，英語單音節詞正逐漸佔主導地位。法語怎樣呢？前面提到的幾位語言學家都說，跟英語相仿，而比英語的詞形更趨向於簡短。更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語言的人稱代詞，多半是單音節的。這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它向我們透露，越常用的詞越趨於簡短。

4.3 說到這裏，科爾格勒恩（B. Karlgren）、馬伯樂（H. Maspero）、費克（F. N. Finck）、蓋比勒恩特茲（G. V. Gabelentz）等歐洲漢學家的錯誤論調便是顯而易見的了：漢語是單音節的，因而是“原始”的。對這種論調，我國學者曾批駁過。這裏還要補充兩點：(1)漢語詞的音節多少的實際情況究竟怎樣？演變的情況又是怎樣？(2)詞的音節多少，跟語言的進步與落後，有沒有關係？把這兩個問題放在漢語與印歐語類型關係中來考察，較爲清楚，因而也較容易解決。

4.4 漢語詞音節多少及其演變情況，應該從定量分析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筆者統

計的結果是：公元前 2 世紀以前，多音詞（主要是雙音詞）佔10%左右；公元前 2 世紀至公元 5 世紀多音詞佔20%左右；公元 6 —19世紀口頭語體裏的多音詞佔40%至70%左右；現代多音詞佔70%至80%左右。大體上可以這樣說，古代漢語中單音詞佔優勢，現代漢語中多音詞佔優勢，演變的總趨勢是詞語雙音化。這是就語言中靜態詞彙統計比例說的。如果就言語中動態詞彙統計，那麼單音詞和雙音詞大約各佔一半。⑱

這是漢語有史時期的確鑿結論。那麼史前時期的情況怎樣呢？根據目前所見到的資料推測，史前時期的漢語有過多音節佔優勢或佔相當大比例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痕蹟還保留在有史初期的記載或古籍裏。如公元前10世紀左右的銘文裏常用“厥”“惟”“肇”“有”等作名詞、形容詞或動詞的詞頭。如說“厥工”“厥臣”“厥休”“厥用”“惟王”“有司”等等。“有”到了《書經》中多作名詞詞頭，在《詩經》中多作形容詞詞頭。從公元前 5 世紀以後，即從上古漢語中期以後，這些詞頭不多見了。由它們構成的多音詞轉變爲單音詞，史前多音節的遺蹟消失了。有時爲追求古奧風格也用到某個詞頭，那已經屬於修辭範圍的事情了。

同漢語演變情況相似，古藏語的詞頭、詞尾有許多是自成音節的，後來跟詞根結合成一個音節。如〔* rdo-bu〕（石—子）＞〔rde' u〕（石子）。⑲

4.5 把上面的比較概括起來就是，從多音節向單音節或雙音節轉化，是有史時期印歐語的趨勢；從單音節向多音節或雙音節轉化，是有史時期漢語的趨勢。縱觀語言的長河，以多音節爲主的階段和以單音節爲主的階段，都只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但是詞的語音形式的縮短與伸長，並不是單向的或反複循環的。詞的長短變化，是以表義爲尺度的。在不影響表義的條件下，詞受語音消減的作用可以縮短；當詞縮短到使大量的同音詞產生而影響表義時，就伸長。這是各種語言共有的規律。因此詞的音節多少跟語言的進步與落後毫無關係。德語和法語比較起來，德語詞的音節相對地多些，法語詞的音節相對地少些，不能因此斷定德語比法語落後，或者法語比德語落後。這正如不能根據身長來斷定人的進化程度一樣。

4.6 詞彙的抽象化與具體化的趨勢

所謂詞彙的抽象化，是指詞彙中逐漸產生抽象詞（或叫概括性詞、泛用詞、類名、通名）。所謂詞彙的具體化，是指詞彙中逐漸產生具體詞（或叫特稱詞、特名、專名）。

法國的葛蘭言說，漢語的詞幾乎都是特名，每一個詞只指明某一特殊的個別的東西，比方說漢語裏沒有說明一般的“死亡”這個詞，而有“崩”“薨”“死”“卒”這些詞，因此漢語是較“原始”的語言，甚至是“最壞”的語言。⑳ 這種說法，不僅不符合漢語詞彙史的實際，而且也不符合漢語與印歐詞彙發展趨勢比較的結果。

4.7 從美國到西歐，再到中國，在一部分語言學家中，較爲流行的觀點是，詞彙逐漸抽象化。這大約反映了詞彙發展趨勢的主導方面。漢語從公元前 4 — 1 世紀（即戰國至西漢），抽象詞所佔的比重逐漸大起來，具體詞所佔的比重逐漸小下去。比如在戰國前的《詩經・魯頌・駉》這首詩竟用了16個馬的具體詞：驈（身子黑而胯下白的）、皇（黃白相間的）、驪（純黑色的）、黃（黃而雜紅的）、騅（青白雜的）、駔（黃白雜

的）、騂（紅黃色的）、騏（青黑成紋像棋道的）、驪（青黑色而有斑像魚鱗的）、駱（白馬黑鬃）、驪（紅馬黑鬃）、雒（黑馬白鬃）、騅（灰色有雜毛的）、騢（紅白雜毛的）、驒（小腿長白毛的）、魚（兩眼邊白色毛的）。㉑ 秦漢以後，這些詞逐漸不用了，代之以抽象詞“馬”。能不能由此斷定。漢語詞彙是由具體到抽象呢？不能！因爲由“馬的特稱”到“馬”這一通稱，這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馬”是在其特稱之前產生的，遠在13—10世紀的甲骨卜辭、銘文中“馬”已經頻繁使用了。同樣，在甲骨卜辭、銘文中，“牛”“死”“老”等等抽象詞也早就多次用過了，而它們的特稱既晚出，又少見。這又是詞彙的具體化。縱觀所見的歷史材料，可以看出詞彙發展的三個階段，兩個趨勢。示意如下：

$$A \longrightarrow C \longrightarrow A$$

（抽象詞）⟶（具體詞）⟶（抽象詞）

（馬）⟶（馬的特稱）⟶（馬）

具體化　　抽象化

這個公式仍然不能把複雜的詞彙發展情況概括無遺。有的史料，只顯示了抽象化這一趨勢（這是主導的）；有的史料，只顯示了具體化這一趨勢。而任何一種趨勢都是隨着社會歷史、社會環境和社會習慣而出現的。

4.8 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不同的特稱詞。到漁獵時代，產生了魚鳥獸的特稱詞。到畜牧時代，產生了家畜的特稱詞。到農業時代，產生了谷物的特稱詞。到了工業時代，產生了機器的特稱詞。這裏面有概念精細化、深化的問題。科學概念也是一樣，很早的時候，只有“數學”，16世紀才產了“算術”“代數”“幾何”“三角”，17世紀以後，又產生了“拓樸”“微積分”“控制論”……。這同特稱詞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從一個角度反映了特稱詞的產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跟語言的先進與落後毫無關係。

4.9 隨着社會環境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特稱詞。在被海水包圍，跟海有密切關係的地方，常有許多海的特稱詞（如日語）。在盛產蘋果的地方，常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蘋果的特稱詞。在畜牧業發達的地方，常有許多畜牧的特稱詞。比如現代蒙古語就有幾十個馬的特稱詞：㉒

| | | | | | |
|---|---|---|---|---|---|
| 通稱〔moer〕 | 雌雄 | 種公〔edʒrəg〕 | 閹割的〔axt〕 | 母的〔guu〕 | |
| | 年歲 | 一歲的〔unəg〕 | 二歲的〔daag〕 | 三歲公的〔urəə〕 | 三歲母的〔bɛɛdəs〕 |
| | 毛色 | 白色〔saarl〕 | 深黃〔ʃarəg〕 | 乾草黃〔xua〕 | 粟色〔xəər〕 |
| | | 棗紅〔dʒəərd〕 | 海騮色〔xɛluun〕 | 青色〔bɔr〕 | 帶斑點〔tʃɔɔxər〕 |
| | | 花花色〔aləg〕 | 白鼻梁〔xəltr〕 | …… | …… |

英國也有過發達的畜牧業，因此在英語裏除了cattle（牛）以外，還有cow（母牛）、ox（已閹割的公牛，役牛）、bull（種公牛）、calf（小牛）等牛的特稱詞。在寒帶地區的語言裏常有許多寒冷、冰雪的特稱詞。如原居北歐的拉伯人（Lapps），有表示不同程度寒冷的11個特稱詞，有表示不同種類的冰的近20個特稱詞，有表示不同種類的雪的41個特稱詞。同樣，在熱帶地區的語言裏常有許多植物的特稱詞。顯然，這都是客觀社會環境的反映，是人們生活的需要，跟語言的進化程度沒有關係。

4.10隨着社會習慣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特稱詞。如在親屬名稱這個語義場內，各語言所用的詞的概括性是不盡相同的。漢語，其次是日語，有較多的親屬特稱詞（當然這兩種語言的有關親屬的特稱詞也不盡相同，更不是對等的）。而英語、德語、俄語等則有較多的親屬的概括性詞。如漢語的“內兄”“內弟”“姐夫”“妹夫”“大伯子”“小叔子”等，在英語裏一律稱之爲Brother-in-law（法律上的兄弟）。又如漢語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日語和匈牙利語也分四種稱呼。蒙語的“哥哥”“姐姐”分別稱呼，而“弟弟”“妹妹”不分，只用一個稱呼。俄語、法語、英語和德語一樣，“哥哥”“弟弟”不分，叫作〔俄〕 paт、〔法〕frere、〔英〕brother、〔德〕bruder，“姐姐”“妹妹”不分，叫作〔俄〕cecTpa、〔法〕sœur、〔英〕sister、〔德〕schwester。而馬來亞語的四種稱呼都不分，一律叫作sudara。如果我們用親屬稱呼的概括性來斷定，馬來亞語是最進步的，俄語、法語、英語、德語次之，蒙語又次，漢語、日語和匈牙利語是最落後的，那麼顯然這種結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再拿法語和德語來比較，法語有許多概括詞（mots omnibus）可以概括德語的幾個詞，如法語的mettre（放）概括了德語的setzen（放入）、stellen（立放）、legen（平放）、hängen（掛起）。如果以此來斷定法語比德語進步，這簡直是一種神話。1952年美國語言學家赫爾(A. A. Hill)曾經揭穿過這一類神話：曾有人說切洛基人(Cherokee)沒有專門表示“說”的詞，而只有14個“說”的特稱詞，因此便說切洛基人是落後的。這種神話是19世紀初期一個傳教士製造出來的。後來一些不清醒的語言學家也跟着傳播

這類神話。

4.11總之，詞彙的抽象化和具體化問題，從本質上說，是思維和語言的關係問題。人們思維活動或認識活動的成果之一是，產生了概念，語言的詞便把它記錄下來。共性突出的一般概念，便用抽象詞記錄；個性突出的特稱概念，便用具體詞記錄。它們之間常有這種關係：圍繞一個較重要的中心概念（如“死”“馬”“牛”“老”等），逐漸出現幾個，甚至幾十個、上百個有差別的名稱，這些名稱各從一個角度反映一個種概念，幫助人們認識概念間的差別。後來隨着思維的發展，在沒有特殊需要的情況下，那些名稱（特稱）大多逐漸消失了，它們所表示的概念個性常常用“屬差加上一般概念”來表示。如不說“驪”，而說“黑馬”；不說“駒”，而說“八歲馬”；不說“耋”，而說“八十歲老人”；不說“沐”，而說“洗頭”；不說“浴”，而說“洗澡”，等等。這就是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逐漸加大原有抽象詞的負荷量或者產生新的抽象詞，而抽象詞正反映了人們思維的抽象化。但是思維的抽象化並不是絕對的，它常常伴隨着思維的具體化或精細化。

4.12 詞的有理據性和無理據性的趨勢

所謂詞的理據性（motivated），是指詞的聲音形式和最初的意義內容聯系起來的理由和根據。它反映了詞的音義聯系的一種性質，也叫詞的內部形式（inner form）。

當代英國語言學家烏爾曼說，漢語是理據性最缺乏的語言。在他之前，索緒爾把世界語言分爲兩種類型：“語法的”類型語言，可論證性（即有理據性）的詞佔優勢；“詞彙的”類型語言，任意性（即無理據性）的詞佔優勢。並說“超等詞彙的典型是漢語，而印歐語和梵語卻是超等語法的標本。”㉓

烏爾曼和索緒爾的結論，大約是從古代漢語的一部分材料中得出的。如果把漢字的理據性和漢語詞的理據性分開的話，那麼古代漢語中的單音詞相當大一部分是沒有理據的，雙音節詞的一部分聯綿詞也是沒有理據的。但是還有一部分單音詞、合成詞、派生詞、聯綿詞是有理據的。如擬聲詞“鏜”，象鼓、鍾、鑼聲。合成詞“輿圖”，戰國時代人們認爲天圓地方，天圓像蓋，地方像車箱（即“輿”），地載萬物正如車箱載萬物，所以“輿圖”就是“地圖”。同理，“肩輿”就是肩上抬的車箱，即“轎子”。

到現代漢語，雙音節和多音節的合成詞、派生詞、擬聲詞已經在詞彙中佔絕對優勢。因此現代漢語的大多數詞是有理據的。世界語言已經證明，在詞素這類初級語言形式和它的最初的意義內容之間，一般是無理據的。而在詞，特別是合成詞這類較高級形式中，多數是有理據的。可見，如果以現代漢語的材料說，那麼烏爾曼和索緒爾的結論便不符合實際。

原始印歐語和梵語有理據的詞較多，現代印歐語的有理據的詞則較少。如英語從古代到中古以至現代，特別是希臘語、拉丁語、法語的詞大量輸入以後，有理據詞出現減少的趨勢。隨着歷史的推移，許多詞的理據性變得模糊不清了，逐漸消失了。比如新概念的命名常常經歷了從詞組、複合詞到單詞、縮略詞的簡化過程。例如 binary units of information＞binits＞bits。葉斯柏森把這個最終形式叫作“省略複合詞”（cliped

compound）。㉔ 所謂省略，其中一部分，從邏輯的角度看，有的省去了種概念，有的省去了屬差。總之失去了論證性。現代漢語的一些縮略詞當然也是這樣，但是一般的詞還是趨向於有理據的。如漢語的“牛犢”“牛肉”是合成詞，比相應的英語的calf、beef顯然是有理據的。法語在表達新概念時，少用有理據的合成詞、派生詞，多用新造的詞根，即多用無理據的詞。而德語則多採用合成詞、派生詞。“在一種語言內部，整個演化運動的標誌可能就是不斷地由論證性過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過渡到論證性；這種往返變化的結果往往會使這兩類符號的比例發生很大的變動。例如同拉丁語相比，法語的一個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任意性大爲增加：拉丁語的 inimīcus（敵人）還會使人想到 in（非）和 amīcus（朋友），並可以用它來加以論證，而法語的 ennemi（敵人）卻無論證。” ㉕

就理據的內容說，各種語言不盡相同。有的多借助於邏輯關係，有的多借助於心理聯想。就理據的數量說，任何語言的任何時期都既存在有理據的詞，也存在無理據的詞；差異只在於兩者的比例不同，而比例在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變化。其變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跟語言的優劣無關。無論哪種語言，其理據性總是相對的，任意性則是絕對的。

## 5 結語

從發生學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看，印歐語和漢語屬於不同的語系。從類型學的觀點看，印歐語和漢語則有許多共同的特點。從歷時類型學的觀點看，印歐語和漢語的語言形式發展的總趨勢是簡化。但是簡化並不等於退化（如 A. Schleicher所說）。因爲，在不影響表義功能條件下，語言形式越簡單、越方便、越容易，越好。又因爲，簡化並不是單一的孤立的趨勢，它還伴隨着一些繁化現象。如詞法簡化、句法繁化，語法的重心轉移到句法。語法手段簡化，詞彙手段繁化。俄語的元音簡化，輔音繁化（主要表現在輔音軟硬對立體系的發展上）。諸如此類，就是語言中的補償原則。

從歷時類型學的觀點看，所謂孤立語、屈折語、綜合語、分析語，都只不過是歷史範疇。語言類型在演變，在交叉，在滲透。演變的路綫，並不像某些語言學家所說的是直綫進化或往復循環，而是辯證地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各語言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特點和趨勢，也出現了各語言之間的共同的特點和趨勢。這些特點和趨勢可以作爲評價語言發達與否的參考，而不能作爲把語言分爲優劣的標準。比如既不能用屈折變化明顯的程度作爲標準，也不能把分折結構作爲終極標準，又不能把向分析結構發展的速度作爲標準，而只能以語言形式的表義功能的强弱爲標準。依據這個標準說，英語、法語、德語、俄語等印歐語，同漢語一樣，都是高度發達的語言。都能夠完美地傳遞複雜的、深奧的任何科學和哲理的信息。

19世紀德國美術考古學者昂華德（Eduard · Gerhad）說過：“美術遺物，一見等於未見，千見始如一見。” ㉖ 同樣，我們對印歐語和漢語史料的觀察還覺得不夠，所得出的結論也有待於討論。

## 其他參考書


高名凱《語言論》科學出版社1965年。

王　力《漢語史稿》科學出版社1958年。

趙元任《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

邵榮芬《漢語音韻史講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愛德華·薩丕爾《語言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

《外國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外語學刊》《現代英語研究》《國外語言學》等中文版雜誌近年各期。

E. 馬卡耶夫《日爾曼語形態結構的歷史類型研究》1972年。

Г. 斯捷潘諾夫《羅曼語國家的語言狀況和語言環境的類型》1976年。

В. В. Вино Град ов《Сов реМеННИЙ русскИЙ》М. 1952年。

Толанов《Морфоло гИя совреМе нно Го русско Го я 3 blka》1962年。

Simeon · Potter《Changing English》(Second revised edition) 1975年。

Brian · Foster《The changin English Langnage》1986年。


注　釋

① 又叫輔音組、輔音群、輔音連綴或複輔音。

② M. B. Пaнов《Русскаяфонетика》M. 1976, 336頁。

③ 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 3 blka》1953, 133頁。Н. Л. Кондрашов《СлаВя нСКие я 3 blКИ》1956, 33頁。

④ P. N. Abahecob《Русское литерaтурное произ нОшеНИе》M. 1972, 66頁。

⑤ 梅祖麟《四聲別義中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 6, 432頁。

⑥ 這是筆者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統計的，把聲調音位計算在內。趙元任說1279個，康拉德說有1380個，又有人說1200個或1382個。

⑦《語言研究與批判》第二輯 314 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

⑧ 王力《同源字典》，商務印書館1982年。本文上古擬音皆引自該書，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⑨ 張成材《商縣方言動詞完成體的內部屈折》,《中國語文》1958, 6, 280頁。

⑩ 梅祖麟《四聲別義的時間層次》,《中國語文》1980, 6, 438頁。

⑪ 維諾格拉多夫《詞的語法學說導論》177頁，科學出版社1960年。

⑫ Н. А. Мещерский《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 Го я 3 blka после Великои ОТечесТ ВеННОЙ ВОЙНbl》1967年，26－27頁。

⑬ Bergen · Evans《Grammar For Today》Atlantic, March, 1960年。

⑭ 梅耶《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方法》76頁，科學出版社1957年。

⑮ 維諾格拉多夫《詞的語法學說導論》171頁，科學出版社1960年。

⑯ Charles · Barber《Linguistic Change in Present-day English》1964年。

⑰ 裴特生《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288－289頁，科學出版社1964年。

⑱ 陳明遠《數理統計在漢語研究中的應用》，《中國語文》1981， 6 ， 469 頁。
⑲ 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164 頁，科學出版社1964年。
⑳ 《語言研究與批判》第二輯315 －316 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60年。
㉑ 呂叔湘《語文常談》71－72頁，三聯書店1980年。
㉒ 道佈《蒙古語概況》，《中國語文》1964， 3 ， 242 －243 頁。
㉓ 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84 －185 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㉔ A. Modern《English Grammar》 6 卷， 156 頁。
㉕ 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185 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㉖ 郭沫若譯《美術考古一世紀》63頁，新文藝出版社1954年。